

帖木儿王朝玉器

● 许晓东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帖木儿王朝(1370—1507年)为中亚河中地区突厥贵族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的帝国。洪武二年(1369年)帖木儿娶西察哈台汗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为妻,因此又被称为“元驸马帖木儿”。首都撒马尔罕(Samarqand),后迁都赫拉特(Herat,又译哈烈、黑拉特)。鼎盛时期,其疆域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为核心,横跨帕米尔高原、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囊括中亚、西亚各一部分和南亚一小部分。帖木儿去世后,子孙间相互争夺王位,最终1507年昔班尼(成吉思汗长子赤术之后代)击败帖木儿后裔,建立乌兹别克汗国。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兵败逃至现在的印度,并在那里开创了莫卧儿王朝。

1405年帖木儿病逝后,帝国陷入旷日持久的纷争,帖木儿四子沙哈鲁(Shah Rukh, 1377—1447年)最终平息各地叛乱,统一了除西波斯之外的原帖木儿帝国辖地,与其子兀鲁伯(Ulugh Beg, 1394—1449年)分驻赫拉特和撒马尔罕。沙哈鲁(1405—1447年在位)、兀鲁伯(1447—1449年在位)父子当政的40余年间,把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建设,以恢复帖木儿扩张时带来的破坏。他采取措施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辟新商道,遍设驿站,重建和新建主要城市,当时的波斯和阿富汗地区因此经济繁荣,伊斯兰文化、突厥文化融合发展。1409年被其父任命为河中地区和突厥斯坦总督的兀鲁伯,本身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诗人和哲学家,被历史学家称为“皇位上的学者”。兀鲁伯治理撒马尔罕30多年,这一时期是撒马尔罕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各国商贾云集,国库充盈,学术文化昌盛,宫廷学者荟萃。沙哈鲁驻守的赫拉特和兀鲁伯驻蹕的撒马尔罕(Samarqand),同时成为帖木儿文艺复兴最灿烂的中心,首都赫拉特更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学术文化中心之一。沙哈鲁父子在位期间与明朝交通不断,玉雕艺术亦在此期得以发展。



一、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交通

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起,帖木儿数次遣使称臣纳贡,以期与明朝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抗蒙古人。但随着对中亚花拉子模(Khwārizm)、阿富汗、东察哈台、金帐帝国、波斯节节胜利,处于进一步扩张领土的需要,1396年帖木儿转而扣押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及明朝在内的各国使节,表示对外宣战,甚至于1404年率领大军意图发动对明的战争,终因途中病逝中断。被扣押达13年之久的明使傅安、陈德文等,得以返国。沙哈鲁继承王位后,与明朝的往来更为频密。两国使节的来往在永乐年间几乎每年一次,宣德年间近隔年一次,正统、弘治年间渐趋疏离,自正统二年(1367年)后,哈烈因道远不复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沙哈鲁派遣五百人的庞大使团来朝。使团成员包括其长子兀鲁伯、次子阿布勒法特·依不喇、三子贝孙忽、四子苏玉尔格哈特弥士及五子穆罕默德·居其王子等,在北京逗留达五个多月之久^[1]。就两地互奉之礼品看,明朝多书币、织金纹绮,帖木儿朝多驼马、狮子等方物。两国间涉及玉石往还的记载首见于宣德七年(1432年),沙哈鲁遣使随明使李贵贡驼马、玉石;随后正统二年(1437年),撒马尔罕、哈烈贡马及玉石。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书谕兀鲁伯,按例赐王及王妻彩币表里,并别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纹绮。景泰七年(1456年)撒马尔罕贡马驼、玉石^[2]。

二、帖木儿朝玉器及其对伊斯兰地区玉器的影响

10—13世纪伊斯兰文献对于新疆玉料以及甘兹尼、伊朗东部贵族使用玉带、玉戒指、玉臂饰、玉鞞带等,已有零星记载^[3]。撒马尔罕所在的河中地区,曾是西辽故地,而辽亡残部西迁前,已制作并使用玉器。另据文献记载,成吉思汗曾三次派遣使臣前往伊朗,带去了包括玉团、银器在内的珍贵礼物^[4](表1)。可见,当时蒙古人已珍视玉器,中亚、西亚地区对玉石也不陌生。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帖木儿虽以武力扬名,他对撒马尔罕的经营可谓倾尽心力。为使撒马尔罕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之名都,帖木儿不惜使用种种手段,招致商人来此贸易。并于所征服之城市中,选拔最良善、最有才干及最有巧艺之工匠,如大马士革的珠宝商、丝织匠、弓矢匠、战车制造家、琉璃及陶工,土耳其的造枪匠、镂金工、建筑师,人数超过15万,可谓百工悉备^[5],其地“工巧过于哈烈”^[6]。这都为该地包括玉石雕刻在内的各艺术门类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及技术基础。

帖木儿朝玉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哈鲁的推动。一则据称抄录自沙哈鲁时期文献的18世纪手稿记载,契丹(当时指北中国或中国)贵族非常珍爱玉石。七色玉石在契丹以及喀什噶尔地区都有出产。生活在当地的Karfirs(指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精



表 1 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交往

时间	明朝	帖木儿帝国	
		撒马尔罕	哈烈
洪武二十年 (1387 年)		遣满刺哈非思等贡驼马	
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年)	遣官诏谕其王, 赐文绮彩币 *		
洪武二十七 (1394 年)		帖木儿贡马二百	
洪武二十八 (1395 年)	傅安赉玺书币帛报之		
洪武二十九年 (1396 年)		帖木儿在锡尔河过冬时 召见契丹国皇帝使者	
洪武三十五年 (1402 年)	遣使诏谕酋长, 赐织金文绮 *		
永乐五年 (1407 年)	厚赉其使, 乃遣指挥白阿儿沂台往祭 故王, 赐新王及部落银币 傅安等赐其王彩币, 与贡使偕行	哈里遣使臣虎歹达送傅 安还, 贡方物 头目沙里奴儿丁 (帖木 儿部将) 贡驼马	
永乐六年 (1408 年)	遣傅安赉书币往 *		遣使随安朝贡, 七年代 京师
永乐七年 (1409 年)		傅安还, 王遣使随入贡	遣使朝贡
永乐十一年 (1413 年)			率诸使达京师, 赏赐有 加
永乐十三年 (1415 年)	命陈诚及中官鲁安偕往, 赐其头目兀 鲁伯等白银、彩币	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 贡 复遣使随陈诚等入贡	复遣使偕 (李达) 来, 贡 文豹、西马及其他方物
永乐十四年 (1416 年)	及还, 命陈诚赉书币报之 *		再贡
永乐十五年 (1417 年)			随陈诚来贡
永乐十六年 (1418 年)	命李达等报如初 *		复贡
永乐十八年 (1420 年)	命陈诚及中官郭敬赉救及彩币报之		偕于阗、八答黑商来贡
永乐二十年 (1422 年)			复偕于阗来贡
宣德二年 (1427 年)			打刺罕亦不刺来朝贡马
宣德五年 (1430 年)		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 入贡	
宣德七年 (1432 年)	中官李贵等赉文绮、罗锦赐其国 (撒 马尔罕与哈烈)		贡使法虎儿丁抵京师 随李贵贡驼马、玉石
宣德八年 (1433 年)	李贵护送使者还, 赐其王及头目彩币 *		来贡
正统二年 (1437 年)		贡马及玉石	指挥哈只等贡马及玉石
正统三年 (1438 年)			来贡
正统四年 (1439 年)	帝命图其像	贡良马	
正统十年 (1445 年)	书谕兀鲁伯, 赐王及王妻彩币表里, 别 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 金文绮		



(续表)

时间	明朝	帖木儿帝国	
		撒马尔罕	哈烈
景泰七年 (1456 年)	减回赐。堪用者止二十四块, 六十八斤, 余五千九百余斤者, 不适于用。赐王卜撒因 (帖木儿三子) 文绮、器物	贡马驼、玉石	
天顺元年 (1457 年)	指挥马云等使西域, 赐彩币, 令护朝使往还		
天顺七年 (1463 年)	指挥詹升等使其国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往哈烈 *		
成化中		阿黑麻三入贡	
弘治二年 (1489 年)		其使自满刺加至广东, 贡狮子、鹦鹉诸物, 却之	
弘治三年 (1490 年)		偕吐鲁番贡狮子等物	
弘治十二年 (1499 年)		来贡	
弘治十三年 (1500 年)		复至	
正德		数至	
嘉靖二年 (1523 年)		又至	
嘉靖十二年 (1533 年)		偕天方、吐鲁番入贡, 称王者百余	
嘉靖十五年 (1536 年)		入贡如故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年)		入贡	

注: 1. 表格据《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明一统志》、《殊域周知录》、《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编制。
2.* 为明朝遣使哈烈之记载。
3. 永乐四年(1406 年), 默德那回回结牙思进玉碗(见《殊域周知录》卷十一,《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 928 页)。

通玉雕, 除了制作玉人外, 也琢制玉剑柄或玉带, 而且价值不菲。无论男女, Karfirs 都以拥有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玉器为荣。河中地区 (Mawaraunnahir) 以及呼罗珊 (Khorasan) 的突厥人一开始对这一艺术并不感兴趣。因沙哈鲁喜欢收藏玉器, 当地突厥人因此也喜欢上玉雕艺术。后来他们不仅通晓玉器, 还成为行家里手, 制作了大量玉器。沙哈鲁的妻子曾花巨资为她儿子的皇冠添加玉背^[7], 这揭示了沙哈鲁时期皇室、贵族对玉器的推崇, 同时也表明沙哈鲁治下的河中地区已经有玉器制作业^[8]。

存世帖木儿王朝玉器虽不多, 但颇具特色。其中镌刻有兀鲁伯名号的玉器目前共见有 5 件。其一是为祖父帖木儿制作的碧玉墓石 (cenotaph 或 tomb stone)。该块碧玉是 1424—1425 年兀鲁伯击败伊犁地区蒙古人的战利品, 现存撒马尔罕。表面除镌刻花卉及



图 1

深色碧玉墓石

帖木儿王朝

乌兹别克斯坦古尔埃米尔陵墓（Gur-e-Amir Mausoleum）藏

几何形开光图案外，还有长篇波斯文追溯帖木儿先祖，记载获得玉石的经过^[9]（图1）。龙耳罐或杯是帖木儿王朝典型的玉器品类，传世较多。例如白玉龙耳罐，颈部浅浮雕兀鲁伯的名号。据口沿及龙形把下方之铭文，此罐后又被贾汉吉尔（Jahangir, 1605—1627年在位）及沙贾汗（Shah Jahan, 1628—1658年在位）递藏，并加刻名号^[10]（图2）。1681—1684年间进入法国皇家收藏、现藏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碧玉龙耳罐，与白玉罐的不同之处在于龙身近颈部有一穿孔圆环，当曾系链连接罐盖，这一做法与金属壶/罐的处理方式相同。而龙尾部的花形雕饰则与白玉龙耳罐同，也多见于金属罐^[11]（图3）。此外，尚有3件龙耳杯，虽无铭文，但龙耳造型类似，推测是同时代作品^[12]（图4）。美



图 2
白玉龙耳罐
帖木儿王朝
葡萄牙古本江博物馆 (Calouste
Gulbenkian Museum) 藏



图 3
碧玉龙耳罐
帖木儿王朝
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France) 藏



图4
深色碧玉龙耳杯
15世纪前期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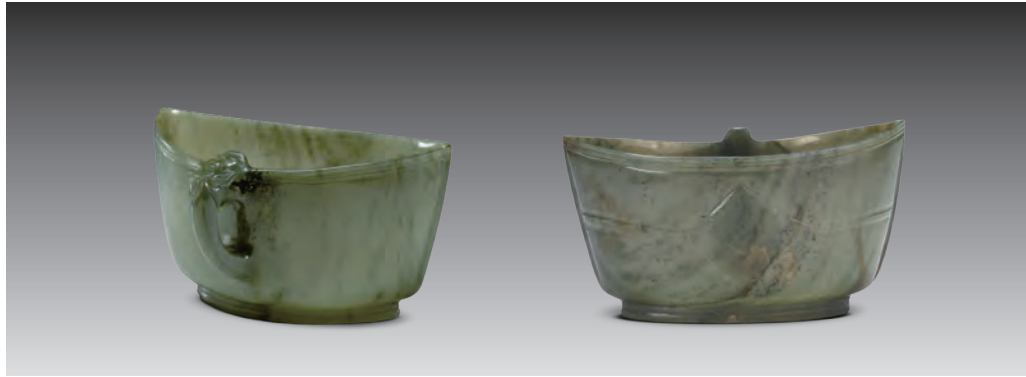


图 5
碧玉杯
帖木儿王朝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藏



图 6
墨玉剑格
14—15 世纪早期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

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龙耳杯，杯身椭圆，口沿、足部装饰弦纹，与其他玉杯不同^[13] (图5)。以龙首为饰的还见有 14 世纪至 15 世纪早期的墨玉剑格 (图6)。这些玉器上的龙首造型特征都非常接近。

上述玉杯、罐或剑格，表面光素无纹或只有波斯铭文，大致制作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有另一类杯、盘、护身符，除波斯铭文外，流行装饰花枝，例如两件花瓣形花叶纹护身符^[14] (图7)、深色碧玉六曲开光花叶纹碗^[15] (图8)、碧玉缠枝花卉纹盘 (图9) 及碧玉缠枝花卉纹碗^[16] (图10)、碧玉错金四曲阿拉伯蔓草纹龙耳杯^[17] (图11)、碧玉错金阿拉伯蔓草纹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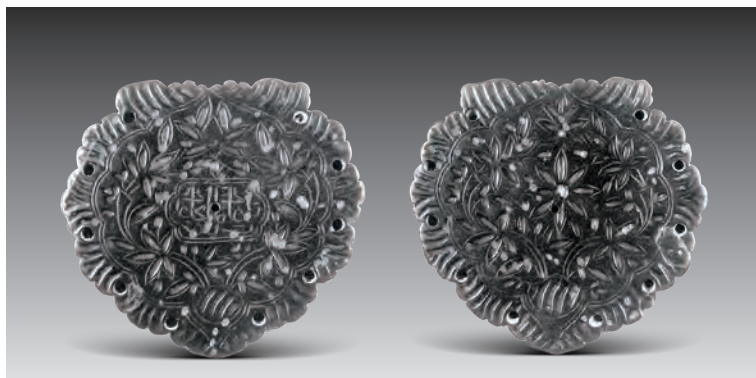


图 7
碧玉花瓣形花叶纹护身符
14—16 世纪初
私人收藏



图 8
深色碧玉六曲开光花叶纹碗
14—16 世纪初
私人收藏



图 9
碧玉缠枝花卉纹盘
14—16 世纪初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Louvre Museum) 藏



图 10
碧玉缠枝花卉纹碗
14—16 世纪初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Louvre Museum) 藏





图 11
碧玉错金四曲阿拉伯蔓草纹龙耳杯
14—16 世纪初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Louvre Museum) 藏



图 12
碧玉错金阿拉伯蔓草纹龙耳杯
14—16 世纪初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图 13
碧玉凤首花卉纹杯
14—16 世纪初
Bharat Kala Bhavan Collection



图 14
白玉花卉纹杯
14—16 世纪初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藏





图 15
黄铜错金银龙首盖罐
1484 年
The Nuhad Es-said Collection



图 16
黄铜错金银动物纹墨水盒
16 世纪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

杯^[18](图 12)、碧玉凤首花卉纹杯^[19](图 13)、白玉花卉纹杯^[20](图 14)。这些玉器大致制作于 14 世纪至 16 世纪初,其产地为中亚撒马尔罕或伊朗,花叶处均下凹,图 7 至图 10 下凹的花叶周边以阴刻线条再加勾勒。图 11 之龙耳杯,杯身分两个装饰带,四曲开光内或开光间装饰阿拉伯蔓草纹,杯内里在玉料本身绺裂处边缘加饰花叶,花叶表面贴金为饰(若贴金非后加,则是所见最早用此方法遮掩玉料瑕疵的做法)。图 12 为八曲开光内或开光间饰阿拉伯蔓草图案^[21]。其余杯、盘、碗几乎不见金饰,唯图 10 据称残留金饰痕迹。或可以推测此类玉器装饰图案表面原本应有金饰。

对碧玉、深色碧玉的偏爱,是帖木儿朝玉器的特色,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碧玉容易得到,也与突厥人视青色为天空的颜色,并认为青色代表孔武有力有关。无独有偶,完成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 年)年的湊山大玉瓮,也是用近于黑色的深色碧玉制作。有学者留意到,河中地区玉罐之造型,源于当时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的黄铜罐。在玉器表面镶嵌金片(丝)的做法应该是受到 13 世纪初开始流行于中亚呼罗珊,进而盛行于其他伊斯兰地区的黄铜镶嵌金银工艺的启发,但这两类器物上使用的装饰纹样还存在



图 17
深色碧玉罐
1618—1619 年
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藏



图 18
碧玉错金凤首杯
1613—1614 年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



图 19.1
深色碧玉错金龙耳罐
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
(Topkapı Palace Museum) 藏



图 19.2
深色碧玉错金嵌宝石龙耳罐
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
(Topkapı Palace Museum) 藏

比较大的区别^[22]。然而，一件 1484 年制作于赫拉特的黄铜错金银龙首盖罐 (图 15)，不论造型抑或纹饰都显示出与帖木儿王朝玉罐的相似性^[23]，另一件 16 世纪的黄铜墨水盒，表面的阴刻缠枝花叶做法，与上述玉器上的花叶类似^[24] (图 16)。玉雕与黄铜制作工艺间的相互借鉴，由此可见一斑。



16世纪初随着帖木儿王朝最为重要的北方城市撒马尔罕以及首都赫拉特的相继沦陷，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当时主要的玉雕中心^[25]。同时，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玉雕工艺同样得到推崇，帖木儿朝玉器因此得以流传，并在贾汉吉尔、沙加罕时期被推至罕可企及的高峰。贾汉吉尔常常在其先祖的玉器上直接加刻自己的名号。例如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深色碧玉罐，无龙耳，但罐身与上引白玉龙耳罐类似，颈部所刻波斯文大意是：玉杯，精选宝石（制作）。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之子贾汉吉尔之杯。愿生命之水储于此杯，王者之水，延年益寿^[26]（图17）。现藏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碧玉凤首杯，与图13之杯极为类似。近口沿碾琢波斯文，歌颂贾汉吉尔的公正，祝愿玉杯与所盛装的酒一样若红宝石般珍贵，并署贾汉吉尔名款。此器据铭文制作于1613—1614年间，可见玉杯形制流传之久远^[27]（图18）。帖木儿朝玉器不仅为其后裔所追捧，亦为奥斯曼土耳其、萨菲波斯等统治者所珍爱。部分作为战利品流入奥斯曼土耳其及萨菲波斯的玉器，被新主人用黄金及宝石镶嵌加饰器表^[28]（图19）。上引诸例可以看到，16—17世纪20年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及莫卧儿王朝玉器无论器形抑或装饰，都显示出与帖木儿王朝玉器的密切关系。因此，帖木儿王朝玉器在15世纪上半叶的兴起，可谓直接带动了16—17世纪西亚、南亚地区玉雕艺术的发展，并对这些地区的早期玉雕面貌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伊斯兰地区玉雕也开始出现新的玉器器形和装饰纹样。

三、明朝对帖木儿朝玉器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及，帖木儿朝玉雕的兴起，源于沙哈鲁对玉器的喜爱，而沙哈鲁对玉器的喜爱，则应是受到当时中国尚玉风潮的影响。两国间频繁的使节往返，为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明代艺术对帖木儿朝玉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崇尚玉石外，还可以看到帖木儿朝玉杯、碗的器形与中国瓷器类似^[29]；龙及龙耳装饰也受中国影响（龙耳器皿自唐代开始即一直盛行）；而图10的缠枝花装饰，颇类元明时期的缠枝莲。大英博物馆藏碧玉螭耳杯（图20），杯沿镌刻兀鲁伯之名号，螭耳扁平，与上述杯、罐之龙耳不同，而近元明时期螭之造型。此杯可能制作于中亚地区，或由居于中亚的汉人工匠所制，更有学者认为乃兀鲁伯永乐十五年（1417年）出使明廷时购得^[30]。

15世纪的新疆地区处于窝阔台后裔控制下的东察哈台汗国，这里出产的玉石，不仅是明朝，同样也是帖木儿王朝乃至莫卧儿王朝玉料的主要来源。除上文所及撒马尔罕、哈烈外，哈密、亦力把力、火州、吐鲁番、鲁迷、天方、于阗等首领自洪武迄嘉靖间，定时或不时地入贡包含玉团、金刚钻、镔铁、玛瑙等方物，直至明嘉靖五年（1526年）之后关闭与西域的边贸^[31]（表2）。金刚钻与镔铁都是可以用于玉器加工的利器。从明廷



图 20

碧玉螭耳杯

1427—1449 年

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藏

表 2 西域入贡方物

国别	年代	贡物
哈密		玉、精钢钻、青金石
亦力把力	永乐四年 (1406 年) 正统二年 (1437 年)	玉璞 玉璞
吐鲁番、火州	宣德五年 (1430 年) 成化九年 (1473 年)	玉璞 金刚钻、玉石、各色小刀
撒马尔罕		玉石、玛瑙珠、水晶碗、番碗、镞铁刀、镞铁铤
鲁迷		金刚钻、玉石、撒哈喇
天方国		玛瑙、金刚钻、镞铁刀、玉石
于阗		玉璞

注：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编制。



回赐标准看，上等金刚钻每颗绢四匹，三等一匹；镵铁二斤绢一匹；玉石每斤绢一匹，可知三者均非常之珍贵^[32]。金刚钻、镵铁在明代玉器制作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明代多层透雕及细密地纹透雕的流行，是否与金刚钻、镵铁的使用而直接导致玉器加工工具的提升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据记载，1562年，当拥有和阗玉矿经营特权的 KhwajaMu'in 得知其子 Sharafuddin Husain 在莫卧儿王朝受到国王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器重并居高位时，借机朝觐阿克巴。KhwajaMu'in 快到安卡拉时，阿克巴亲自前往迎接，款待规格堪比伊斯兰托钵僧，给了 KhwajaMu'in 无上的荣耀。KhwajaMu'in 奉上了来自明朝以及喀什噶尔的奇珍异宝，其中应该即有玉石，此行旨在打开印度的玉石市场^[33]。可以想见，明嘉靖五年（1526年）后随着与西域各国关系的渐趋疏远，新疆玉料开始主要流向西亚、南亚，为莫卧儿王朝玉器的繁荣提供了原料基础。

注释：

-
- [1] 出使闻见详细记录见于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7年。
- [2] 张廷玉：《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7—8602页。
- [3] 许晓东：《13—17世纪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1期，第56、57页。
- [4] Stephen Markel, "Fit for an Emperor: Inscribed Works of Decorative Art Acquired by the Great Mughals", *Oriental Art* 21:8, 1990, pp. 22-36. A. S. Melikian 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Bloomfield Hills, 1997, New Series, Vol. 2, pp. 123-173.
- [5] 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7页。
- [6] 张廷玉：《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8602页。
- [7] 穆斯林文献称北部中国为Khata或Khita，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Kitay或Cathay。这是一件抄录于1891年的手稿，手稿内容是关于各种玉石的神奇疗效的。手稿中的一段记载据说来自于Mahammad Haji。Mahammad Haji曾应沙鲁克的要求撰写一部有关各色玉石疗效的著作，该手稿现珍藏于印度海得拉巴德色拉金（Salar Jung）博物馆图书室。详M. L. Nigam, "Fl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Maruti Nandan Tiwari & Kamal Giri ed., *Indian Art and Aesthetics: Endeavours in Interpretation*.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Guwahati (ASSAM) in association



- with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New Helhi, 2004, pp. 13-18。
- [8] 喀什噶尔当时隶属东察哈台汗国，东察哈台汗国不仅坐拥最为重要的玉矿源，也是明朝与帖木儿朝之间的交通孔道。
- [9] 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Jade*, London, 1991, p. 275.
- [10] 里斯本（Calouste Gulbenkian Collection），约1447—1449年制作于撒马尔罕，高14.5厘米。贾汉吉尔回忆录中记载了另一件制作于兀鲁伯时期的白玉罐，颈部有兀鲁伯名号及年款。贾汉吉尔又命玉工加琢他自己及阿克巴大帝名字。A. Rogers, H. Beveridge ed., *The Tuzuk-i-Jahangiri or Memoirs of Jahangir*, vol. 1, 1909, p. 146。还有一件类似形制的碧玉龙耳罐，高11厘米，私人收藏，图见 Stephen Markel ed., *The World of Jade*. Mumbai: Marg Publications, 1992, p. 42, fig. 9。
- [11]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Jades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Somogy Editions d'Art, Paris, 2016, pl. 222. 高13厘米。图录作者认为是杯。
- [12] 两件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另一件曾被沙阿巴斯奉献给阿德比神庙，现藏伊朗德黑兰（Bastan Museum），口径16厘米，详 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Jade*, London, 1991, p. 276, fig. 6. Barbara Brend, *Islamic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Michael Knight etc, *Chinese Jade: Ming Dynasty to Early Twenties Century fro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2007, p. 320, pl. 362.
- [14] A. S. Melikian 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p. 154, fig. 18, 19.
- [15] 法国私人收藏，见 A. S. Melikian 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pp. 150, 151, fig. 12。
- [16]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Jades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Paris, 2016, pp. 208, 206, cat. 166, 165.
- [17]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Jades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Paris, 2016, p. 220, cat. 176.
- [18]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 [19] Bharat Kala Bhavan Collection. 镌刻有兀鲁伯、贾汉吉尔名号。
- [20] Michael Knight etc, *Chinese Jade: Ming Dynasty to Early Twenties Century fro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p. 320, pl. 362.
- [21] 卢浮宫藏有另一件碧玉碗，器表装饰类似。
- [22] 相关黄铜错金银器详见 James W. Allan, *Islamic Metalwork: The Nuhad Es-said Collection*, London, 1982。
- [23] James W. Allan, *Islamic Metalwork: The Nuhad Es-said Collection*, London, 1982, pp. 110, 111.
- [24]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类似形制的墨水盒在12—16世纪的伊朗十分流行。
- [25] 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Jade*, London, 1991, pp. 274—295.
- [26] 现藏大英博物馆，高10.3厘米。A. S. Melikian Chirvani, Saïlânî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13,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Neil Kreitman Foundation (UK), 1999, p. 101.
- [27]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高7.8厘米。也有学者认为其造型源自兀鲁伯银杯，制作年代可早到帖木儿晚期或萨菲波斯早期，详 Robert Skelton, *The Indian Heritage: Court Life and Arts under Mughal Rule*, V&A, pl. 9, p. 113。



- [28] J. M. Rogers,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The Treasury*, Boston, 1987, pls. 48, 50. 同样的黄金、宝石镶嵌，不仅施用于玉器，也同样施用于瓷器、水晶、金器。
- [29] 永乐四年（1406年）默得那（即麦地那）回回结牙思所进玉碗，或与图8、图10之玉碗类似。记载见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二〇《礼部》，中华书局，2007年，第595页。
- [30]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Jades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Paris, 2016, p. 211, cat. 175.
- [31] 明朝与西域的玉石贸易记载详邓淑苹：《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上的重要意义》，《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452—454页。又见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〇五《礼部》，中华书局，2007年，第579—581页。
- [32] 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一二《礼部》，中华书局，2007年，第595页。
- [33] 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Jade*, London, 1991, p. 272.